

军事话语及其传播研究

——以《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为例

刘 虎

摘 要：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对外军事话语传播意义重大。在此以《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白皮书在消除所谓“中国威胁”、对外树立中国军事安全形象方面的话语策略与困难所在。另外，笔者认为，在建设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军事话语传播获得了新机遇与新功能，由中国引领的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潮流，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也因此为中国的军事话语传播提供了新的内涵与影响力。

关键词：大国崛起；中国梦；军事话语传播

作者简介：刘 虎，男，副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E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4-0014-06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问题之一。2012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设想。2013年至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中国提出并逐步付诸实施。另外，中国还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述重大理念的宣告和行动计划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国际政治思维的关键性转折，即由长期秉持韬光养晦，正式走向担当大国责任，勇于向世界宣示自身的宏伟计划和蓝图。中国近三年来的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际合作计划的提出和开展，不仅初步启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换，而且它将给中国的对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在此中国崛起的全新阶段和背景中，笔者试图结合国际关系理论，选取《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作为分析的对象，以期为新时期的军事话语传播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中国军事对外传播的国际关系困境

要分析中国的军事对外传播，需要先分析中国崛起面临的理论困境以及国防外宣所处的传播环境。在政治传播中，穆雷·埃多曼（Murray Edelman）将这种政治环境（Political Settings）描述为“任何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对人们观察和回应产生限制作用的环境”^[1]。即国防部发言欲达成的目标与其本身又受制于哪些长期存在、尚未解决的国际关系困境。

（一）现实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威胁论”

最近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国际形势发展日益波橘云诡，一方面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崛起呈现出更加强健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力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围剿所谓“独裁国家”，取得节节胜利。在国内，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日益增长的维稳压力；在国际上，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均出现紧张状况。中国实力的壮大在加大西方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的同时，其所面临的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也从未减少。虽然中国多年来一直通过多种途径来宣讲中

国的发展道路和意图，但“中国威胁”的论调一直流行于国际社会，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的行动就是明证。

无论是中国崛起，还是今天中国梦计划启动并付诸实施，中国给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带来的最大压力就是“中国是一个挑战者”。纳兹勒·舒克瑞（Nazli Choucri）和罗伯特·诺思（Robert C. North）在研究国内发展与战争的关系时对历史上不少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奥匈帝国）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发展是国家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内发展和国家扩张都与军事开支、同盟和国际暴力有关。^[2]

在新现实主义的分析视野中，中国崛起其实就是对“均势”状态的破坏，是对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包括权利分配）的破坏。^[3]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多年来力图遏制中国崛起，防范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16世纪的西班牙、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美国，就属于这样的霸权国家。到头来，最强大的国家会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或世界大战。”^[4]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大国被认为存有进犯的预谋。一个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5]

上述分析揭示了为什么多年来中国在消除“中国威胁论”方面所做努力巨大，却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中国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之后，如何面对新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中国仍然没有较好的应对措施。这一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单纯的宣讲就能取信于他国的，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试图消除西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关系中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二）制度差异导致中西大国间认同有限

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对外传播工作中，包括国防部新闻发言，对外发布《国防白皮书》等，往往包含着促进国家间理解和认同的目标。然而，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缺乏认同的情境中，一个崛起的大国给对手只能投射出令人恐惧的负面国家形象。建构主义理论对认同和共享的文化观念的强调，为中国和平崛起并社会化又提供了一条思路。中国崛起所伴随的实力的增长如何能够不为美国等大国惧怕？德国、日本的崛起大体上没有导致“安全困境”的发生，英国、法国、德国彼此之间在军事上也无须相互防范，其道理就在于温特所言：“大部分国家置身其中的重要结构是由观念构成的，不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6]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崛起乃至中国梦的提出和实践，最大的对抗性力量就来自于当前的霸权国美国。当前中美关系可以看作是洛克无政府文化状态下，大国对异质的、相对弱小国家的容忍而不是真正的集体身份认同。在温特所列举的用来解释国家间施行亲社会的安全政策、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变量中，^{[6] (429-452)}中美之间渐渐形成“相互依存”，可以培养“共同命运”感，甚至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但是中美两国缺乏较为关键的“同质性”。十八大报告，中国明确提出坚持现有发展模式的“道路、制度和理论”自信，这也表明中美要取得建构主义视野中的认同，仍然任重道远。在中国崛起势头越来越明显，甚至已经开启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新模式时，中美之间的本已十分匮乏的战略认同将大打折扣，而中俄两国近几年关系日趋紧密即是明证。

二、《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话语分析

中国政府2011年3月发表了《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界定出包括“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内的

六大“核心利益”，并首次提出“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中东的变局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提出了挑战和警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充满疑虑和防范，但同时也期待中国担当负责任的大国重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一客观环境和现实下，中国的军事安全话语应如何表达，是一项极富技巧又十分困难的工作。

放在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无论如何去定性是否“崛起”，都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面临的所有对外关系和涉外矛盾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在白皮书中有提及，说明中国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例如：

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矛盾不时显现。（《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的军事话语的表达，应服务于这一目标并力图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话语分析

在上述矛盾和现实下，中国军事话语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宣示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意志，传递和平发展的声音。运用语料库软件（Wordsmith 4），将国防白皮书与参考语料库进行对比分析之后，高频词主要有：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推进、制度、加快、政策、企业、促进、财政、服务、继续、增加、支持、文化、扩大、增长、金融、合作、战略、和平、装备。

在这些词的前后搭配中，基本没有任何词语显示了中国扩军备战、寻求主导地位或试图挑战主导国地位的意思。具体而言，以下语句都是值得肯定的措辞和出色的表达：

1. 前言部分

“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密不可分”。白皮书以“新的历史起点”一词，来暗指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崛起，拥有世界第一的巨额外汇储备。这一瞩目的实力和地位，必然引起世界的关注和思虑。因此，白皮书开宗明义地在前言部分就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并且希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 安全形势

在安全形势部分，白皮书以较为委婉的语言触及中美之间的核心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矛盾不时显现”。所谓新兴大国这里至少包含中国，此表述说明中国清楚地将自己定位为“新兴大国”，它与崛起国概念不过是毫厘之分而已，用“新兴”一词则去掉了“崛起”给人带来的紧迫感，反而还增添了“兴旺”和机遇的含义在里面。文中还具体指出了恐怖主义、经济安全、气候变化、核扩散、信息安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对各国安全威胁明显增大。全球性挑战的表述和明显增大这一定性，则传达了全球一体、危机共担的意思。提示中美冲突的语句仅一句：“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3. 国防政策

在国防政策部分，白皮书将中国的国防政策定性为“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一表述力图向外界展现一个非进攻性、秉持防守底线和理念的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白皮书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在台湾问题上，主张“竭力避免再出现骨肉同胞兵戎相见。两岸应积极面向未来，努力创造条件，通过平等协商，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这些提法和表

述的核心是中国力促和平，尤其是在对台政策上，相较于过去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现在的表述则温和、理性也积极得多。

4. 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

这一部分涉及军队的建设，与之相联系的敏感问题则是所谓中国的军力扩张问题。白皮书在本章开头就肯定了中国已经拥有一支“强大军队”，但旋即就强调中国在对军队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5. 武装力量运用

在这一部分，白皮书强调中国主要在以下情形下动用军队，即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参加国家建设和抢险救灾；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外联演联训；国际灾难救援。这些功用没有一个与中国试图获取领导地位、挑战当前国际秩序的假想有关联。它甚至还突出了中国军队对内对外的服务功能，展现了中国愿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愿望。

6. 国防科技工业和国防预算

中国国防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国防经费预算问题同样敏感且易引起外界关注。关于国防工业发展，白皮书主要提到以下要点：提高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三点中后两点是非进攻性的，表达了和平与合作的愿望。在带有一定震慑性的第一点中，其所表达的内容也在外界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即通过提升与国防有关的科研生产能力来提升中国军事实力。显然，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不进行军事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在作为一个国家军事情况报告的国防白皮书中，不能不提及有关军事方面的建设情况。综观世界大国，重视发展与军事有关的技术是当今科技发展的潮流。在国防经费方面，2008年和2009年，中国年度国防费分别为4178.76亿元人民币和4951.10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17.5%和18.5%。在增长的事实下，白皮书指出中国年度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略有下降”。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话语策略，即在军费增长的情况下，突出说明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略有下降”。白皮书还提供了一张图表，显示出自1998年以来，中国军费占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下降的趋势。

7. 建立军事互信和军控与裁军

建立军事互信的主要内容有：战略磋商与对话；边境建立信任措施；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地区安全合作；对外军事交往。磋商、对话、信任、合作和交往等一系列带有友好性质的词汇的使用，以及这些议题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对于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而言都是建设性的。作为一个军事大国，能够致力于通过军事交往，以及双边或者多边谈判来建立临时或长效的地区安全机制，是值得仿效的榜样。

军控与裁军内容则包括：核裁军；防扩散；禁止化学、生物武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常规武器军控。同样地，白皮书在这部分的话语策略也是通过精选合适的议题体现出来的。这部分不仅不包含任何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内容，相反，这些议题和内容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主张和倡导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迎合了当今世界军控裁军发展趋势和潮流，其主张和内容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例如：（1）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一贯主张”一词的运用，体现了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这一涉及人类生存与毁灭的大问题上的积极态度。（2）明确承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明确承诺”一词则表现出中国没有任何以大欺小、拥核自重的霸权心态。

因此，单从该白皮书的措辞而言，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白皮书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判断基本合理；对中国安全政策的描述既为自卫还为世界和平服务；对军事现代化的描述一方面表明中国跟从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对外显示了一种威慑力；对军事力量描述的部分，更表明了中国军事力量主要为国内建设和世界和平服务的功能。另外在国防工业建设、国防经费开支说明、建立军事互

信和军控与裁军等章节,白皮书都以恰当的措辞,合理地解释了外界疑问,并传递了和平、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利益的良好愿望。

(二) 国防白皮书军事话语传播效果

白皮书的发布,不是一件简单的国际公关活动,它有着明确的发布对象和试图达成的目标。它希望向对中国有影响力的国家传递和平的声音,并希望达到消除疑虑、增进合作、缓解中国安全环境压力、保有并延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目的。

白皮书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传播效果,这是很难量化确定的,但却不难分析其可能的结果。如上分析,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内容和措辞威慑性极小,通篇充满了和平、友好与合作的内容,并且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愿有所担当的愿望和能力。非常明显,中国正尝试在最为外界担忧的军事安全领域,努力塑造一个和平、亲善的大国形象。

不过,需要明白的是,在政治传播、公共关系高度发达,政治宣传早已沦为负面词语的国际社会,希望通过政治话语去改变一种冲突性的关系结构,甚至取得某种深度的政治认同,可能有相当的难度。政治话语的效果将止步于内容实质所能达到的最远边界。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显然不能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疑虑。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是异质的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可能会因不当的武力宣示和激烈的措辞而激化,可能因恰当的和善话语传达而维持现状,但不能因任何精巧设计的话语而消除。

三、中国梦时代的军事话语传播

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梦、“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重大设想和举措的提出和实施,给国际政治经济版图带来震动。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方的地缘优势,比美国更有利于扮演辐射他国的大国领导角色,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明证。现今从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的势头,说明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信心,以及他们急切需要利用“中国机遇”的心理。这一新的动向表明,虽然原有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强大的同时会继续发酵,西方世界对中国制度的疑虑以及相应的对中国建构认同的困难依然存在,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军事话语传播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全球化日益巩固并加深了“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状态。^[7]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约束可以使得中国和美国等大国减少对抗和冲突,制度主义为“和平”崛起描绘了理论上的行动纲领。这一理论从一方面能够建构起中国作为合作者、建设者的正面形象。然而,相互依赖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想下的合作也存在着诸多引起冲突的因素,如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之争,相互依存也可能引发更多冲突,如中美经贸摩擦;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决定着国家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和破坏制度的几率。^{[4](278-280)}

从亚投行初创的实践看,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的主因是不愿中国成为领导者,而中国也利用这次机会洞察了西方其他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对待美国的态度,即西方国家在经济合作的机遇面前,并非不会产生分化,欧洲的美国盟友积极加入亚投行,愿意在中国的主导下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抢抓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说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梦的启动,实际上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经济领导形象,它直接拓展了合作的维度并消除了很多过去担忧的合作困境问题。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合作的观点认为国家总是追求本国绝对获益的最大化,并不关心其他国家的获益;其实由于生存利益的驱使,各国对相对实力的损失非常敏感。^[8]

现在看来,上述关于合作不确定性的担忧显然只有理论意义,当中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和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时,当中国充满了经济发展机遇时,对于这些充满“理论上担忧”的国家而言,它们可能

不得不搁置所谓中国强大对自身构成威胁的预期，而是更为关注自身能不能从中国机遇中分得一杯羹的问题了。这一新的变化将是未来中国制订国防白皮书应加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四、结 语

上述现状是国防部新闻发言乃至制订国防白皮书应予参考的新政治环境。既然所谓“中国威胁论”不可避免，且试图消除这一认识的工作任重道远，那么中国国防部门、外宣部门可着眼于新增的传播空间和机遇。中国梦以及与之相随的中国自信，将渗透到中国的军事对外传播中，原有的发言口径预计将根据逐步变化的中国国际地位和角色加以调整。中国梦和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需要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获得更加广泛和积极的国际影响。在这一关系当前中国发展的大势、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产生直接影响的宏伟蓝图中，中国的军事话语传播将不只是政治立场的表态，也将是重新塑造中国形象、描述新的中国角色，向世界表明崛起后的中国的诉求和机遇的载体。

参考文献：

[1] 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102-103.

[2] Nazli Choucri,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M].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5 .

[3] 叶江.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2).

[4]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M]. 张小明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 17.

[5]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M]. 王义桅, 唐小松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2.

[6]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M]. 秦亚青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 383.

[7]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M].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8-29.

[8] 约瑟夫·M·格里科. 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合作的限度：对最近自由制度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 [A]. 大卫·A·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16-117; 126-127.